

英语教育 与教师教育研究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第3辑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013062705

H319.3

160

V3

英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第3辑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编



H319.3

160

V3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708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 第3辑/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所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656-1518-4

I. ①英… II. ①首… III. ①英语—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319.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9068 号

YINGYU JIAOYU YU JIAOSHI JIAOYU YANJIU

英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第3辑)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所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62 千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编 委 会

主 任

林 立

委 员

(按姓氏音序排序)

曹莉群	曹 敏	杜维平	蒋 童
康 燕	林 立	刘军利	齐 齐
宋 洁	孙 岳	孙咏梅	王秋海
王 峥	杨 阳	赵秦玲	赵 婴
周晋英			

编辑部

主 编

杜维平

编 辑

扈瑞芬 宋金鸿 王雨婷

目 录

理论探索

语言意义的形式化理论问题思考	赵 华 隋 然(3)
作为副词短语作用域的介词短语之语篇意义	周晋英(13)
英国教师专业标准研制的历程与启示	王 峥(21)
提高大学英语教师教学能力的思考	汪 消(29)
二语习得中母语迁移现象研究综述	边智慧(33)
关于英语课堂中母语使用的反思	柏凌波(39)

话语研究

社会文化理论与第二语言习得	林 立 李 琳 杨 洋(49)
语言变异研究:语言研究的新发展	孙咏梅(58)
培训学校简介文本的自我推销性	张雅俐(65)
培训机构教师社会身份的建构	张培培(71)

大学英语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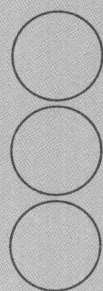
英语专业八级考试阅读部分效度评析	曲春红(79)
图式理论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应用研究	王全珍 孙雪梅(86)
翻译教学中提高学生翻译能力的课堂实践设计	方 红(91)
英语听力学习策略与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行动研究	张 莎(96)
英语专业四级听写错误实例分析	陈 颖(104)
论“英语听说读教学”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闫慧娟(113)
词汇性语意协商在文字聊天和视频会议中的应用	邓利华 朱 丹 杨 薇(118)
“完整情景”中的“完整语言”教学模式	邓小燕(125)
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口语交际意愿的个案研究	李懿然(132)
从主位推进模式看连贯与英语作文质量的关系	张 思(139)

中小学英语

- 行动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李一飞(151)
- 以人文关怀为视角探讨中小学英语课程设计
及其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的改革问题 王 霄(157)
- 论新课改推进过程中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教材观 武慧兰(165)
- 探究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张莉波(171)

文化、翻译与文学

- 以 Grice 的会话合作原则为框架谈身势语对语言信息的补充 宋 洁(179)
- 翻译教学中的学生角色 李 青 张建新(184)
- 西方电影中的东方神韵 富晓妮(187)
- 天主与天的“亲缘” 王雨婷(193)
- 关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跨文化述评 雷 慧(201)
- 从目的论角度论戏剧翻译 陈 莉(207)
- 论自由间接引语在意识流小说中的作用 李或娟(213)



理论探索

语言意义的形式化理论问题思考

北京工商大学 赵 华 首都师范大学 隋 然

摘 要:在语言意义理论研究中,语言学家遭遇的是哲学的传统问题——语言与思维问题。将人类思维过程视为计算过程是当代心理学提出的一个假说;认知科学认为,人类的认知就是知识的逻辑运算,也即思维就是计算,这最终将导致语言学研究进入自然科学领域。信息的计算化处理与语言的意义发生最广泛的关系,对于伴随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动态发展的语义形式化研究而言,势必要解决自然语言及其意义的形式化问题,也即人类言语思维的形式化问题。语义形式化如同计算化,其取决于先验语言的表述,包括深入的原则陈述、系统的形式化、理性主义重建、新概念和新范畴的不断提出等等。形式化或计算化的目的在于逻辑语言对自然语言进行严格和精确的描写并完善这一过程。

关键词:语言与思维;语言意义理论;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语义形式化

语言是一项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础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在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符号研究中,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关键问题。在语言符号系统内,演绎模式与语言意义的关系最为密切,一般被理解为信息传达的主要途径。这涉及语言的功能问题,并通过语言的结构和形式反映出来。语言意义的研究迄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仍然妨碍语言学成为货真价实的“严格科学”,尽管语言符号和语言形式的描写已经达到很高的严格程度。对于内容表达而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自然语言都存在“意义”和“意向”两种概念,它们对应的是本质上二位一体的两种实体:内容表达与信息传达。在这一语境中,语言学家遭遇的是哲学中的传统问题——语言与思维问题。

1. 语言哲学认识论中的语言意义理论问题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 Rorty)在《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1979)中,以戴维森(D. Davidson)的研究思想为主要依据,对认识论(epistemology)和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的关联问题进行了探索,并试图将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联系起来,

并成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关系的元层次(metalevel)分析。罗蒂首先将认识论视为认知研究的传统学说——对心智以外所有事物的精确表示,以及对该表示构成方式的理解和对普遍表示理论的创建,其基础是视觉隐喻(picture metaphor)和镜像隐喻(metaphor of mirror),而将这种认识论或传统认知理论予以具体化表达的则是洛克(J. Locke)、笛卡儿(R. Descartes)和康德(I. Kant)。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海德格尔(M. Heidegger)等哲学家则提出了其他的一些研究方法。

在语言哲学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变体现象,比如弗雷格(G. Frege)和塔尔斯基(A. Tarski)的“纯粹型”语言哲学,不存在认识论上的预设观点,也不触及哲学的传统问题,以及罗素(B. Russell)、卡尔纳普(R. Carnap)和奎因(W. Quine)的“混合型”语言哲学,从中可以发现明显的传统认识论痕迹。戴维森认为,“混合型”语言哲学将纯粹的意义理论与传统的认识论研究混为一谈,从而导致此后的操作主义(operationalism)、实证主义(verificationism)传统主义(conventionalism)等流派产生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变体。所以,有必要在语言哲学概念中消除非认识论倾向,与此相关的是消除意义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差异,并对康德关于情感接受与先验概念差异一说进行语言学意义上的重新阐释。这实际上并非意味着尝试描写现实的真理和最终结构,而是意味着对现实仅仅进行部分描写的方法,也即对语言的使用情况实行描写的方法。语言真值理论(theory of linguistic truth)研究方法最终将导致两种可能性的丧失:既不能将哲学问题进行形式化表述,也不可能说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使得问题的研究变成对各种语句使用条件和状况的解释。

分析哲学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对意义进行分析,意义理论不仅是认识论的理据,而且也是整个哲学的理据,语言哲学是研究理据的学科,认识论问题只有在意义理论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这一被语言哲学视为“第一哲学”的意义理论引起明确的异议。理查德·罗蒂指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未提出认知理论,也未感到提出认知理论的必要性,笛卡儿和洛克未提出意义理论,但他们都提出了哲学中的基本问题。理查德·罗蒂在研究语言哲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时,对“混合型”语言哲学提出批评,认为不应该将问题从认识论引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认识论的“超级任务”是阐明语言的工作机制,发现语言“套住”世界的奥秘,其中自然也包括真值和认知成为可能的原因。如果说语言在事实关系上与世界紧密相连,那么人类将永远处于与世界的联系之中,同时也将永远面临丧失与世界联系的风险。奎因反对区分综合句子(synthetic sentence)和分析句子(analytic sentence),也反对把每一个语句从术语简化成模式,因为这势必无法指明言语主体的丰富情感经验。奎因认为,“经验主义

教条”的前提是研究孤立的句子，在理论语境中偏离其功能，只检验个别句子的真值，而非考察其整个系统。整体论(holism)及其研究方法将知识的真值问题引入整体评价范围，这实际上也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问题。罗蒂认为，哲学面临的风险就在于对科学和非科学进行区分。罗蒂及其他哲学家的观点试图说明认识论及语言哲学问题的特点，指出以语言意义理论为核心的分析哲学搁置了语言的预设性和先验性，忽视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本性寓于语言之中”这一事实，因为人类生存的第一空间是语言，在认识研究上要赋予语言以应有的位置，所以在意义理论语境下的语言研究似乎对认知理论毫无成效，应该首先将语言视为“世界经验”，将语言的认知问题的研究从语句层面转向人类作为认知主体所拥有的语言整体论研究方法层面上来，其中语言已不仅仅是符号系统及其意义，而且还是历史文化语境，甚至是“本体论视界”，因而解释学(hermeneutics)及其语言研究线索的“本体论转向”对认知哲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有望走出“纯粹认识论”的误区。

加达默尔(H. Gadamer)关于语言在视度认知和表达中的作用的论述也很有意义，比如人们言语中的“落日”表达的是现实视度，任何处于静止状态的人看到的都是这一景象，对于人类的观察而言，“落日”具有现实性，因为这一现象与人类存在相关联，并不能以科学的视点予以否认(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是地球运行旋转而产生的现象，不存在“日出”或“日落”的问题)，真理本身与对待世界的态度相关联，不存在完全纯粹意义上的真理，只有语言才能现实性地完全开启对待世界的特定态度，其中的视度与科学具有共存的权利。语言不仅保存常性的东西，而且还表达变性的东西，并且使凌驾于个体意识之上的现实变得清晰可见。加达默尔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并非是反射思维的产物，世界的语言经验具有绝对性。”显然，这种解释学思想与其他各种不同的语言学理念总体上应该成为现代认识论及认知哲学的基础，并在人类学语境中及历史文化前提下予以研究。

对科学性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与叙述性知识(narrative knowledge)之间差异的研究导致语言与认知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与科学性知识相对应的叙述性知识指的是以叙述形式表现并为语用学所研究的知识(生活知识)。与认识论不同的是，认知哲学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语言，因而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知识便成为基本问题之一，同时在研究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方面具有社会文化意义。对科学性知识和叙述性知识的对比研究旨在解决“语言游戏”的一般研究方法问题。“语言游戏”现象如同“生活形式”，但“语言游戏”方法同样可以阐明语言的区别以及科学性知识和叙述性知识之间互为对立的特点。语言事实导致语用学研究的出现，其中包括“语言游戏”一说的创立

及其方法的使用。人类的知识不仅仅是科学性知识,也不仅仅产生于具有真值标准的所指性语句,很多知识依托的是各种评价语句,这些所谓的叙述性知识并非完全与语句形式相关,它们通过叙述传达语用原则,建构社会联系。因此,叙述性知识引出大量的“语言游戏”。

科学性知识排除所有“语言游戏”的可能性(但不包括具有真值评价意义的所指性语句,因为这是一种证实性和仿造性语句),以前在语句中积累的知识随时都可能被否定或忽然推翻,而那些直接实现社会文化联系的“语言游戏”也排除在科学性知识之外。与叙述性知识的“瞬间性”不同的是,科学性知识具有“历时性”,一方面在记忆中存储,另一方面又需要新探索。鉴于这种区别,不能以科学性论点评判叙述性知识,也不能以叙述性观点评判科学性知识,它们的标准各异,评判将造成错误。长期以来,所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划分也正是基于这种差异,这实际上也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差异,后者通过语用原则确认自身,无需寻求论据和证据。

2. 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语言的意义视为语言学的核心概念,那么就必须以十分精确的科学性手段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的客观描写,但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至关重要。

早在17—18世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茨(G. W. Leibniz)就对哲学话语的自然语言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各种自然语言的民族性、地域性、不精确性和不规则性无法为哲学提供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推理,其主张在哲学话语中用数理逻辑语言取代自然语言。尽管这一想法未能完全实现,但至少表明了人类对自然语言的理性认识。以语言形式为载体的人脑与电脑的逻辑结构区别就归结为自然语言与非自然语言的本质性区别,尽管二者都具有逻辑结构,但后者具有的是精确的逻辑结构。所以,人脑与电脑的交际工具目前只能是逻辑语言,而非自然语言,计算机只能接受高度形式化的逻辑语言。将人类思维过程视为计算过程是当代心理学提出的一个假说。在认知科学中,符号主义(symbolicism)认为,认知是知识的逻辑运算(operation),而思维就是计算(computation)。将自然语言规则予以形式逻辑化表达并使之可以“计算”,这只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和识别研究的首要步骤,而研究心智表现及其运算的认知科学理论追求的是心智研究的物质体现,这最终将导致语言学研究进入自然科学研究。如今,自然语言的形式化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科学语言学的概念及研究方法逐渐产生和形成,其研究成果已经得到计算机科学的承认和接纳,并成为计算机逻辑语言的基础理论。

自然语言的形式化研究涉及人类智力活动计算能力的结构问题。在深入研究计算机理解和识别自然语言的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从“电脑是否思维”转到“人脑是否计算”上来。如果说人脑的本质就是计算,并在科学的方法论意义上得到实证研究,那么与人类记忆、知觉、意象、概念等相关的自然语言理解和识别问题便可以成为计算机程序的研究对象,并通过递归性、聚合式、范畴化以及类型存储、水平搜索、垂直搜索、几何编码、语符编码等信息加工手段显示思维过程,从而得出类似人脑的输入输出系统、计算模拟描述和计算常规结构。自然语言的计算化技术致力于以可执行的程序代替日常语言的推理式解释,因而这也是自然语言逻辑形式化技术。

目前,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分析和描写仍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形式化如同计算化,取决于先验语言的表述,包括深入的原则陈述、系统的形式化、理性主义重建、新概念和新范畴的不断提出等等。形式化或计算化的目的在于完善逻辑语言对自然语言描写的严格性和精确性,没有先验语言的表述,就谈不上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和计算化。现代计算机程序一般包括机械模仿和理解力模仿两个因素,其中机械模仿因素远远多于理解力模仿因素,而机械模仿这种模拟技术就是形式化技术,所以任何计算化的自然语言分析都主要依赖逻辑语言对这种分析的表述。自然语言的高度形式化描写对计算机程序的机械模仿至关重要,但这种形式化并非意味着纯粹的形式特征。

计算机程序是否可以成为人类理解力模仿的合适模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理解力模仿不同于机械模仿,它们之间的区别非常类似自然语言中形式操作与意义操作之间的区别。机械模仿涉及的是形式性质,而理解力模仿涉及的却是准语义性质,这两种模仿方式在计算机程序中往往错综复杂地共存,只是理解力模仿方式还十分薄弱。现阶段计算机以机械模仿为主并通过逻辑语言与人类的自然语言对话,这可以被视为计算机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和识别自然语言,但还远远不够。现代逻辑学家对自然语言逻辑关系的句法和语义特征做出了区分,而对于逻辑形式化观念而言,表示句法和语义特征的逻辑语言(或元语言)孤立于感性意识,忽视或排除了意向意义、真值条件以及双语对译的等值性等复杂的直觉智力操作,自然语言表述的非常规推理和各种预设知识无法进入计算机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识别。即使是具有操作可能性的“形式语义学”或“纯语义学”,也无法解决人类计算所涉及的语境规约意义。“由于现代计算概念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新概念,与新技术的发展关系密切,因而在取自其他领域的旧有区分的框架(如形式和内容、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区分)内不能把握它,我们对此完全不应该感到惊奇……人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区别神经元变形的生理形态和计算功能,也能够

区别机械模拟提供类比的那些计算功能活动和理解力模拟提供类比的那些功能活动,包括内心表示。”(科恩,1998:228—256)

3. 语言意义与言语思维的形式化研究问题

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所有自然语言中分离出共同的内核,并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自然语义语言”,而“所有语言的共同内核可以被视作大量具体语言的同构现象,可以用于同一普遍自然语义元语言的不同语言学特点的变体阐释”。(Вежбицкая,1999:29)然而,“自60年代中期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产生以来,其基本假说和目的一成不变:寻求普遍的语义要素,拒绝人为的‘特征’和‘标记’,排斥意义表象的逻辑系统”。(同上:39)

这就出现了疑问:排除意义表象的逻辑系统,科学语义学或认知语义学是否可以成立?而这种语义学恰恰对作为“人类二阶大脑”(绝非人类大脑的延伸)的电脑理解和处理自然语言至关重要。“语言与思维”的传统基础研究认为,首先要在意义表达和接受方面辨别语言的各种基本和辅助功能,于是认知理论问题、情感经验与经验概念的关系问题、语言使用的方式和目的问题、信息及情感传达问题、个别和共同知识表达问题、语言的社会功能问题、语言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乃至最终思维本身的实现等问题,统统被推至前台。人类的所有思维都是以经验为出发点,并最终返回到经验的终点,在某种意义上数学的情况也是如此,问题是人类在科学研究中究竟与什么类型的经验打交道。至于语言学研究,其经验却具有本质上的悖论性——“思维经验”。认知理论习惯于区分思维与经验、思想与事实,语言学却又是“思维形式的思维”或“二阶思维”,因此语言学中的经验材料便是思想。从普遍相对论角度看,事实就是思想,就是一种脱离其产生语境的思想,也即以独立个体面貌被证实和展示的思想,如同日常生活用品一样。所以,物化的思想便是事实。在语言科学中存在经验与思维、事实与解释理论之间的区分,但这一区分归结于思维本身的自然属性,它存在于思维内部并对思维发生影响。事实充其量只不过是完成的思想,仿佛是某种固定下来的音、形、义同构的言语形式。

显然,在自然科学中,思想从未知趋向已知,新知识对旧知识做出补充,而语言学旨在发展、深化、扩充已有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这些已有的知识常常表现为混乱的未经很好整理的思想或事实,于是在经验与理论之间产生了相对性差异,这种现实材料与理论结构之间的差异导致对经验进行整理和说明的需求。当然,如果理论本身变成经验也未尝不可,只要它取得相对终结性的结果并成为新的语言学研究的原始材料。语言学总结语言发展的聚合关系,追寻并分析已经形成的各种高级和低级形式,并在言语活动主体目不可及的层面上

确定其联系。因此,传统语言学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在本质上常常表现为一种纯粹的语言学及历史知识的功能,具有其独自的规则和语言游戏类型,具有其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惯性研究方法。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语文学、历史学、文化历史文献学及其他相近学科不可能在理想的‘科学性’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尤其是形式化知识的福荫下发展”。(Микешина, 2002: 499)类似的观点和判断目前在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领域中都占据上风,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观性都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但也不应该忘记,在已往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又何尝不存在惊人的主观性并导致许多荒谬的结论呢。语言学研究不可能杜撰语言事实,其探寻新事实的可能性远远低于自然科学,但这并不能改变语言学研究认识论与方法论不断发展的本质,何况自然科学的使命也远不仅仅局限于发现新事实而已。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不断追求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其实现语言学研究科学性的愿望日趋强烈。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曾为语言的意义问题所困扰,认为语言的意义研究无法达到语言的语音和形式研究的精确程度,结果提出了所谓的“无意义语言学”,意义被排除在科学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意义问题成为科学语言学的薄弱环节。

认知科学似乎对语言学的这一窘迫状况有所改变,传统的思维与意义问题再次成为哲学以及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问题最终还进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随着乔姆斯基(N. Chomsky)生成语法的出现,与形式系统相关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引起了不同科学领域中众多学者的极大关注,因为这一语法首次提出了言语生成过程及其机制,在语言结构内部分离出语法(句法)系统的作用,并在这一系统中探究出特殊的由词汇单位生成语句的机制。至于说生成语法未能将句法与语义、语言能力与外部认知能力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其缺陷,不过正是这一缺陷以空前的力量促使语言学界努力去填补所谓“乔姆斯基语法句法基要”所造成的语义空缺。

毫无疑问,语义空缺并未得到填补,无论是所谓的“形式语义学”,还是所谓的理论—模型语义学,都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目的,即使是精于语句类型逻辑演算的“蒙塔古语法”,也只是在理论上证明了一个信念,即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在理论体系上具有同一性,但却无法完全自如地反映自然语言丰富和复杂的意义,逻辑语言的高度精确性与自然语言普遍的模糊性、较低的精确性以及较高的直觉判断效率性和可能性在句法和语义方面是否能够达到真正的统一,这仍然是语义学形式化研究的最大难题。

不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就不可能研究人类的思维问题,反之,不研究人类思维的概念结构问题,同样也不可能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语义形式化研究

涉及语言学的科学性问题,对语言学研究意义重大,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作为现代理论模型特点的计算化技术的应用,信息的计算化处理与语言的意义发生最广泛的关系,因而语义学的形式化研究势必伴随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的动态发展,旨在解决自然语言及其意义的形式化问题,也即人类言语思维的形式化问题。这项工作十分艰巨,但在科学语言学中必须追求并接近这一目标,而且现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也未必不可行,否则将严重制约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人类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语言使转瞬即逝的日常生活经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并将其形式化。人类这种把获得的知识形式化的方法,最典型地表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中,几乎全部西方知识的结构都建立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之上。按照这种逻辑,人类可以对自己的思想对象进行分类,由此形成概念,然后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论证和把握知识。在人类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思想符号化”和“符号通识化”,没有符号化的过程,人类只能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很难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且也无法与别人分享。从本质上说,符号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加适合思想,也是为了交流和分享思想成果。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的程度越高,传播和交流的效率也就越高。但人类思想和心智的功能毕竟存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能够解释的思想过程,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和记忆等,另一方面则是人类迄今尚无法做出解释的心智过程,包括情感、情绪和意志等。

4. 结语

从对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隐喻角度以及语言事实性的系统自身角度看,意向性是人性的主要部分,也即人类从精神和物质生活中获取意义的方式,而人类及其言语行为的开放性与意向的终结性表现出其自身的悖论,它们在意识和生物等多种层面上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并导致发生转变。在这一转变的语境中考察人类的言语活动,其交流性和目标性在与其他系统的类比中更为明显。关于语言系统和言语系统的封闭性和开放性二元论势必引发界定方式的再认识,并促进二元论认识方式的转变,从而设立新的复杂层面和平台以使封闭性和开放性相互依存。人类个体的基本行为、记忆、感觉保持着所谓“一体的图式连续性”(Weiss, 1970: 213)。在一种层面上,人脑是“混乱的”,而在另一种层面上,人脑则具有非常复杂的模式,两个层面彼此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简化,而是相互补充,处于统合状态。与人脑复杂的结构相适应的自然语言形式化研究必须考虑等级序列性、统一和互补的功能化及模式确认等。迈尔(E. Mayr)指出:“新实体在更高的整合水平上予以组合时,不是新实体的所有

特点都是其构成特点的逻辑的或可预测的结果。”(Mayr, 1988: 34) 帕蒂(H. Pattee)也曾经说过:“生物组织……具有无限的能力用以演变新功能以及新的控制等级水平, 同时在每一水平上保持相对固定的基本构成。”(Pattee, 1973: 106—107)就语言学话语而言, 言语行为各种功能之间的转化并不明显, 但却具有神奇的力量, 其事实依据在于生命系统与活动环境之间所保持的平衡状态, 至于该平衡状态如何反映并运算, 这是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其中涉及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以及他后来又提出的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等问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人脑中储存的自然语言不仅仅意味着完整的一套词汇、语法以及习得的“开放观”, 自然语言的完整存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事实。这种完整存在的自然语言正在被科学的自我意识和主导的逻辑语言所分解, 并将其置于研究对象的地位, 但科学的自我意识和主导的逻辑语言自身同时又是由自然语言建构而成的事实, 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很难单纯从工具意义上看待自然语言。

参考文献:

- Блинов А. Л. 1992. Формальная онтология действий[С].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одели действия. Ин-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РАН. - М.: Наука.
- Вежбицкая А. 1999.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и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ов[М]. Пер. сангл. А. Д. Шмелёва, под ред. Т. В. Булыгиной. -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Звегинцев В. А. 1996. Мысли о лингвистике. - М.: Изд-во МГУ.
- Иванов Н. В. 2002. Проблемные аспекты языкового символизма (опы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 Мн.: Пропилеи.
- Кацнельсон С. Д. 2002. Типология языка и рече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Изд. 2-е, стереотипное. -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 Киссель М. А. 2002. Метафизика в век науки.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Кобозева И. М. 2000. Две ипостаси содержания речи: значение и смысл. Язык о языке: сб. статей / под общ. рук. и ред. Н. Д. Арутюновой. -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Кондратьевна П. Р. 2001. Реч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кибернетика. Изд. 2-е, доп. -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 Кронгауз М. А. 2001. Семантика. М.: Рос. гос. гуманит. ун-т.
- Мельчук И. А. 1995.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модели «Смысл - Текст». - Москва - Вена: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енский сла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
- Микешина Л. А. 2002. Философия познания. М.: Прогресс - Традиция.
- Carnap R. 1951. The Nature and Application of Inductive Logic.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